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主观幸福感的 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娄伶俐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主观幸福感的 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娄伶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娄伶俐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419-2

I. ①主… II. ①娄…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0693 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娄伶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25 插页 4 字数 248,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419-2/F·1973

定价 32.00 元

序 言

虽然很难完全清楚大自然为什么要让人类进化出感受幸福的能力,但很容易清楚的是,自从人类拥有这种能力以来,幸福感始终是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自私的人追求一己的幸福感,高尚的人则追求更多人的幸福感,或者说拥有从他人的幸福中获得幸福感的能力。但是在人类执著地追求幸福的时候,对于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怎样才能得到更多幸福等关键问题,却并没有能够弄清楚。许多人活了一辈子才发现自己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走错了方向,无数学者穷尽毕生才智也没有得到这些问题的满意答案,直到现在全人类一直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徘徊摸索。

自从人类进入经济社会以来,人们就把幸福感与财富和收入联系起来。现代经济学更是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等哲学思想基础上,通过“财富=消费=效用=幸福”的公式,把人类的目标统统转向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狂热,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经济学的标准建筑材料,建立了自以为可以解释所有人类行为,以及所有人类行为推动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庞大理论体系,即所谓的“经济学帝国大厦”。但是当经济学沉浸在由此带来的巨大满足感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因为幸福是比效用更复杂的人类心理体验,效用无法涵盖其全部意义。现代经济学以效用作为人类的唯一目标,

必然造成经济学研究与人类根本福祉目标的偏离,很难有效把握人类经济行为及相关的社会经济规律。大量的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人类的幸福感并不一定随着收入上升、消费增加而上升。伊斯特林 1974 年发现的这种幸福悖论,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和价值提出了致命的挑战,使自以为什么都能解释的现代经济学陷入了恐慌。

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摆脱这个困境,现代经济学开始反思以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开始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性假设,把人类行为研究和实验经济学等以往被正统经济学排斥的研究领域和理论方法纳入经济学的体系,发展了大量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理论。这些工作对被幸福悖论动摇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起了一定的加固作用。但是,这些修补显然不足以完全克服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面临的问题和恐慌。要把经济学从这种恐慌中真正解救出来,就必须重新审视以往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基本假设,更多地把经济学研究建立在人类最根本的动机,也就是追求幸福感的基础上。否则,经济学就会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失去它的主要价值。

把经济学直接建立在人类追求幸福感的基础上,意味着要对人类幸福感的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这正是现代经济学进入这个一直是心理学家领地的最主要动因。但是,人类幸福感的产生机制非常复杂,涉及人类的生理、心理、思想、意识等许多方面,也与外界环境有复杂的联系,而且幸福感是一种很难测度的主观心理感受,因此,研究幸福感的规律不可能是容易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并不是很愿意涉足这个领域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很慢。娄伶俐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定为从经济学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幸福感的规律,应该说是比较有勇气的,本身就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

这本著作就是娄伶俐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娄伶俐在这本著

作中,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结合生理学和心理学相关研究成果,在以往学者提出的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社会攀比等概念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幸福与效用的区别和联系,对幸福感的概念范畴、影响因素和决定机制,以及幸福悖论的内在规律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设计了专门的调查问卷,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进行了调查,对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和收入幸福函数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姜伶俐的这本著作从理论上揭示了,由财富收入和商品消费等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的显性因子具有边际幸福递减的倾向,而由亲情交流、健康休闲等无法用货币计价衡量的非经济因素组成的隐性因子则是边际幸福感递增的,隐性因子在幸福感生成中的作用远大于显性因子,这些正是幸福悖论的重要根源。这本著作通过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分析的主要命题和结论。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横截面样本中幸福仍然是收入的增函数,但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中,这种关系却不复存在,而这也与国际相关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幸福感问题的意义、幸福感的内在规律,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问题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本著作所采用的结合经济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对于进一步开展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谢识予

2010年2月6日于上海上地公寓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	1
二、幸福的伦理渊源及研究背景	8
三、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定义	17
四、本书的研究方法、意义与结构安排	20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8
一、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法	28
二、主观幸福感的现代经济学研究	37
三、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状况	47
四、主观幸福感研究对效用理论的拓展	50
五、简短的评论	54
第三章 主观幸福感的神经心理机制研究	57
一、主观幸福感的构成成分及其关系研究	57
二、主观幸福感产生的神经生理学机制	60
三、主观幸福感的生成路线图	69
四、经济学幸福研究与脑技术的发展	76

五、效用与幸福的偏离	80
六、本章小结	84
第四章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	88
一、理论概念的界定	89
二、“幸福悖论”的博弈分析	98
三、经济学的幸福理论分析	103
四、认知偏误幸福函数的理论和实例分析	119
五、幸福理论的补充研究	134
六、本章小结	136
第五章 主观幸福感理论的实证研究	140
一、问卷设计	140
二、抽样方法、数据处理与计量原理说明	162
三、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175
四、本章小结	252
第六章 对国民幸福指数体系的拓展讨论	257
一、经济发展指标的反思	257
二、国民幸福指数体系——HPI 简介	259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265
一、结论	265
二、本书的不足与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270
附 录	273
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313

第一章 导 论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幸福研究一直被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者)认为是社会学或心理学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应该关注生产、消费、商品、通货等客观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的研究。其实不然,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研究恰恰是建立在人的主观心理感受基础上的,并将涉及人类福祉的苦乐感受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这种意义上,对人类幸福的研究本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

一、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

经济学最早是以对家政的管理而出现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政治学》之中的,在此书中,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价值基础进行了伦理意义上的界定,并把社会约定俗成的“正义价格”作为经济活动的伦理准则。经济学与政治学、伦理学之间的血亲联系,使它们都对人类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幸福,产生了深切的关怀。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在他 1871 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章中,把“有用的物品”称为“Goods”,也就是经济学里的所谓“商品”,在道德哲学里则

是“善”的意思。一种物品所具有的商品性“goodness”，恰恰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高于一切具体的善”的“善性”，即幸福。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一）早期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经济学家们对快乐或痛苦等有关人类幸福的情感元素的研究是不吝笔墨的。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59)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名句中就揭示了人类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趋势，即同情，每个人都会从别人的幸福中获取快乐，而这种“同情共感”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人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幸福的主要情感机制(Sugden, 2005)。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89)的功利主义学说(utilitarianism)进一步地把心理体验联系到“数”的意义，开启了幸福研究的“数量”化先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63)第一次把功利主义幸福思想引入经济学，创立了早期效用主义经济学说。经济学中的效用来自于功利(utility)。对早期效用主义者来说，效用其实就是对快乐享受的满足程度。

边际效用理论的开创者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71)则直接把经济学作为是一门苦乐计算的学问。他认为物品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或负痛苦)的性质便是物品的效用，“财富与价值的性质，由无限小量的快乐与痛苦之考虑来说明”^[1]，“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以最小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就是经济学的任务”^[2]。在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斯(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188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90)的古典理论或新古典理论里，也把物品的效用看作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是商品带

给人的“快乐”或“痛苦”的总和。马歇尔在其 1890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用“满足”代替“快乐”,用“损害”代替“痛苦”,来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物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3]。这些研究明显地受到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使 19 世纪经济学的核心建立在商品带给消费者的快乐感觉能力的“效用”分析上,并且这种效用是基数可测的。这些论述显现了经济学对幸福关注的伦理本质。

但是,在经济学经历了序数效用革命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这种渊源联系便不复存在了。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96)最早发起了“去心理化”的效用理论革命,将情感因素从经济理论中驱逐出去,以偏好取代享乐体验,使效用仅仅成为一种能够显示行为的偏好顺序的函数,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发生转向。帕累托革命的理论成果,经过希克斯(Hicks)等的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了消费者选择理论的标准范式,确立了序数效用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有关“幸福”或者“快乐”思想的研究逐渐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家们不再深入探讨人类欲望的本质问题,而是将注意力投向了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诸如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等。

(二) 现代经济学幸福研究的回归

也许由于在精致华美的“理性经济学”宫殿逗留太久,经济学家对幸福的研究变得相当迟钝。在很长时间里,经济学都不再问津“幸福”问题,而把幸福研究拱手让于社会学或心理学。直到 1974 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发现了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证明不同国家的收入与幸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幸福感差异也并不明显,这才使沉醉于财富领域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幸福研究产生兴趣,这一发现也对经济学的传统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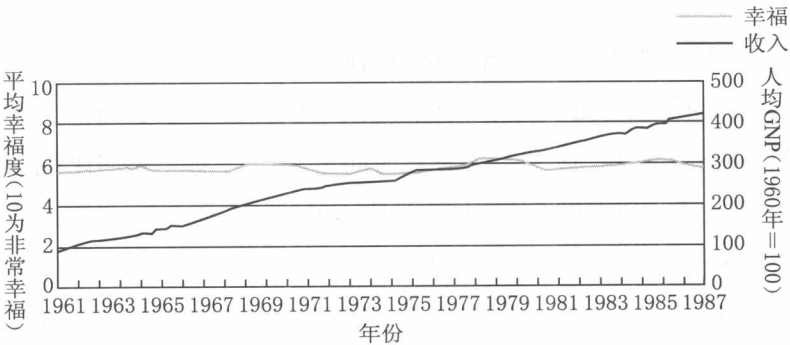
函数提出了挑战。

传统效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经济越发展,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各种理论模型理所当然地设定高收入会产生高的效用和个人福祉,效用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即:

$$U = U(Y), U'(Y) > 0, U''(Y) < 0 \tag{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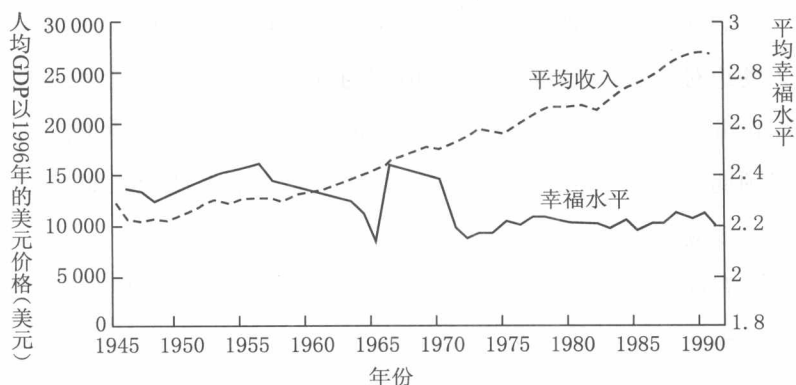
这种对效用或幸福的简单化处理方式,在很长时间里妨碍了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深入探索。

幸福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的日益富足,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这么简单。从图 1.1 和图 1.2 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从 1960—1987 年,收入增加了 4 倍,但日本人所报告的平均幸福水平却基本上未变,保持在 6 左右;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很明显,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剪刀差的形式,幸福水平不仅没有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反而还出现了略有下降的趋势。在 1946—1991 年间,美国的人均收入从 1.1 万美元增加到 2.7 万美元,增加了 1.5 倍,但幸福水平反而从 2.4 下降到 2.2。



资料来源:Veenhoven(1993).

图 1.1 日本平均幸福与平均收入的对比



资料来源: Frey and Stutzer (2002).

图 1.2 1946—1991 年间美国人的幸福水平与平均收入情况

这些经验事实表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GDP 与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不相干。高收入、高消费并不能带来高幸福感。

收入和效用之间的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U = U(Y)$, $U'(Y) > 0$,这条基本的经济学铁律曾经被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所有个人的福祉研究,但今天它需要面对怎样的命运决断呢?

在对博彩中奖者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前一年中大奖的人所报告的福祉只比控制组的稍高一点,两者之比为 4.00 : 3.82 (Brickman et al., 1978, p. 921)。收入的增加最初会促进幸福感的极大提升,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奖现实之后,就会对其作出适应性的调整,中奖增加的平均效用就不会比中奖前明显高很多。这表明,人们对过去的经历有着极强的适应性。

另外的研究发现,与朋友、同事的收入比较会极大地影响个体的收入效用水平 (Duesenberry, 1949; Hirsch, 1976; Clark and Oswald, 1998)。不仅如此,人们还会拿现在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与自己过去的情况进行比较,这导致了高收入与高幸福之间必然联系的消失。

最后,收入的增加会不断调整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不是看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看收入的预期与现实实现之间的差距是多少(Easterlin, 2000; Michalos, 1991; Inglehart, 1990)。如果收入水平超过预期,就会产生很大的满足效用;如果收入水平低于预期,就会有收入负效应的产生。

所有这些导致偏好变化的心理机制的现实证据的发现,导致效用理论的福祉意义上的革命。人们的真实效用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绝对收入水平,也取决于社会比较的相对收入及期望水平。根据幸福研究的发现,可以把效用函数改写为:

$$U = U(\delta Y, \bar{Y}, Y^E, X), U'(Y) > 0, U'(\bar{Y}) < 0, U'(Y^E) < 0 \quad (1.2)$$

其中, Y :个人收入, δ :适应系数,且 $\delta < 1$, $\bar{Y}$:社会平均相对收入, Y^E :期望水平, X :影响幸福的其他因素。

这个效用函数包含了更多心理学的内容,比起人们显示性行为选择所表现出的偏好,能更好地刻画人们的幸福水平。

上述这些以可观察事实为基础的幸福研究,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对于收入和幸福之间关系的看法,不仅引入一些新的变量,甚至对传统效用函数的结构关系提出了挑战,颠覆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效用理论需要从幸福的角度进行相应的拓展和完善。

在幸福研究中出现了像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黄有光(Yew-Kwang Ng)、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H. Frank)等很多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各自在自己感兴趣的幸福研究领域跋涉前行,从“效用”、“快乐(或福祉)”、“公共政策”、“地位商品”等方面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修正和发展。他们的研究对解释“收入—幸福悖论”,对拓展微观效用理论都起到了积极

作用,并正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产生日渐显著的影响。幸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经济学科也呈呼之欲出之势。经济学开始回归传统,开始回到自己的出发地。但与传统经济学的幸福研究不同,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得益于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现代发展,不仅在幸福心理的揭示上比早期更为科学,而且在快乐或痛苦的测量上也比早期有了重大的突破,使早期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基数效用测量成为可能。

早期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效用的基数测量,并把效用的“量”的多少作为经济活动的决策依据,但由于社会科学不发达,他们对效用的测量不得不求助于对市场中人们的行为选择的经验观察。这一观察方法最终被序数效用论者(Samuelson, 1938)所采用,成为效用偏好的唯一的经验认知基础。“显示性行为”理论使效用概念与快乐或幸福的研究初衷发生背离,使现代经济学的效用研究仅仅停留在了偏好指数的层面上,偏离了幸福或快乐的原旨。许多经济学家,如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Ng, 2004)在把效用的研究提升到幸福或快乐的层面上作出了很大的开创。本研究也试图在这一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和尝试。

尽管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关注较其他学科为晚,但幸福研究所引发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变革程度却远远超过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总和。

第一,幸福研究打破了经济学的基本“理性定律”,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禀赋效用(endowment effect)(Thaler, 1980)、参考点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Kahneman and Tversky, 1991)等一系列经济行为心理规律的发现,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作出了很大的修正、补充与完善。

第二,经济学的幸福研究使经济学从物质的稀缺和人类的欲望两

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解脱了出来,并在两者中搭建了人的适应性、社会比较和期望调整的心理桥梁,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第三,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最根本地改变了新旧福利经济学把对人类福祉的研究局限于偏好或效用的做法,把经济学的福祉研究提升到人类幸福或快乐的终极层面,将效用从幸福的角度重新界定,回归了经济学的伦理本源。

第四,幸福研究所发现的经济变量对人类幸福感的影响规律,有助于纠正经济调控和经济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对人类福祉的系统偏差,为经济运作更好地服务人类福祉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总之,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而且是一门研究人和财富的关系的科学。诚如 200 多年前马歇尔所坦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4]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正是经济因素研究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的巧妙结合,回归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这种回归,对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福祉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对于这门学科即将爆发出来的经济理论革命和社会伦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们拭目以待。

二、幸福的伦理渊源及研究背景

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经济学应该回到它的出发地,无论经济学如何发展,它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Socrate)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伦理命题,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不能不面对的。^[5]

(一) 幸福的伦理渊源考察

在人类的思想文化史上,对幸福的追问,主要形成两大理论流派:

一派是“快乐论”；一派是“实现论”。前者以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为代表；后者以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1. 实现论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 384—前 322 年)的伦理学通常被称为幸福论(eudaemonism)或自我实现论(self-realizationism)。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名著《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提出“作为一种性质的善”和“作为一种关系的善”两种“善”。后者是作为手段的善,被叫做“有用”,也即休谟(David Hume)所说的“utility”(效用)。前者是事物内在的优良属性,是“因其自身而善的善”。现代经济学的“善”(Goods)往往是作为手段的善,是“为达到自身善而善”^[6]。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所寻找的“至善”(supreme good)即“可达到的最高善”,也就是“幸福”。^[7]幸福因其本身的善而成为幸福,是“一切善的事物(比如快乐、荣誉、德性——笔者注)的始点和本原”^[8]。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政治学都非常重视对实践或实现活动的研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善”放在人的功能(即区别于动物的理性活动)中加以研究。他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9],是人类理性功能的体现。快乐必须在理性的控制下达到适中的程度,才能称之为幸福。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具体行动去追求一个终极或完满的善。

尽管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德性和善在幸福中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忽视作为生命基本功能的快乐和痛苦的存在。他认为,“伦理德性就是关涉快乐和痛苦的德性”,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情感都伴随着快乐和痛苦”^[10],所以“我们总是以快乐和痛苦来调节我们的行为”^[11]。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中包含快乐的元素,他认为人们是从享乐中引申出福祉、至善等概念的。但同时,他也认为快乐不一定是最高的善。快乐和痛苦贯穿于人的生命的整个过程,并对德性和幸福的生活